关于文艺理论研究的两封通信

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觉首先是理论的自觉。文艺理论家王元骧和董学文在他们的相互通信中，呼吁开展对文艺理论功能、价值和作用的讨论。文艺批评家对文艺作品的褒贬评价，取决于文艺批评家的美学素养和文艺理论素养。推进文艺理论的繁荣与发展，是磨砺文艺批评锋芒、提高文艺批评有效性的重要途径。本报刊发王元骧和董学文的两封通信，以期引起学界和批评界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切实重视，并期望就此问题展开深入认真的讨论。

——编 者

王元骧的信

学文同志：您好！

看到您2月22日在《文艺报》上的大作《要高度重视文艺理论研究》，觉得很好。我越来越感到我国当今文艺理论研究受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的影响太深，完全以评论（文艺批评）来排斥、取代理论，以致把文艺理论研究逼到了绝境。这不仅直接关系到文艺理论，而且也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我为此深感忧虑。您在北京有影响，我建议您可向有关报刊建议，就文艺理论的性质和如何加强文艺理论建设这个问题，集中刊发几篇文章，作些专题研讨，使学界对文艺理论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文艺理论就难以发展。

最近我就这个问题写了《文学研究的三种模式和理论的选择》和《也谈文艺理论的“接地性”》两文，分别发给《文学评论》和《文艺争鸣》，近期将会刊出。现先让孩子用电子邮件发给您，望能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您关于文学理论研究科学性的思想我早已留意，觉得很值得研究，待我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时，也想写一篇。现在，我们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精力有点分散，若能大家集中来研究一些重大的基本问题，不求共识而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思考，这对我国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来说肯定是有意义的。

王元骧

3月27日

董学文的信

元骧老师：

您好！

大札奉悉，迟复为歉。谢谢您的鼓励和支持，也谢谢您的宝贵“建议”。近期我就同《文艺报》的负责同志联系，看能否在他们那里开展学术讨论。

我同意您的看法，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文艺理论本性、功能和价值的理解有偏误，又由于受各种外来西方学说的影响较重，所以，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艺理论作用的发挥，以致使它走到您所说的“绝境”之地步。我撰写《要高度重视文艺理论研究》一文，就是冲着当前文艺理论研究羸弱、创新不足、风气不正且不受重视，距离时代要求和人民希望甚远有感而发的。倘若能通过讨论集思广益，深入地分析现状，客观地总结经验，密切与时代、生活、创作的联系，切实解决一些问题，使文学基本理论研究得到重视，使理论自身的素质得到提高，使学术争鸣和学派建设得以推进，那无疑是文论界的一件幸事。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加强文艺理论建设”。胡总书记在九次文代会、八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中也殷切期望“要高度重视文艺理论研究”。刘云山同志最近还提出“社科理论界也要‘走转改’”。我觉得，这些号召都是有现实针对性，很及时的。我们文艺理论界应当行动起来，努力把重视和加强文艺理论的工作落到实处。

董学文

4月30日

自觉地为人民服务

□黄 河

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人，不仅应当是文艺的主要表现对象，而且应当是文艺的主要服务对象。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文艺创作要坚持为人民服务，文艺创作主体就必须解决如何看待自身的现实境遇问题。

这里以1957年的“探求者”为例谈一下当下如何坚持文艺创作为人民、文艺创作者如何看待自身的现实境遇的问题。

1957年因酝酿创办同人杂志“探求者”月刊而撞上“反右”成为轰动全国的江苏省“探求者”社团成员，一共有高晓声、陆文夫等8人。到该年12月，其中 6位被打成“右派”。高晓声作为首先提议办同人刊物的“主谋”，被发回原籍常州武进务农编筐。梅汝恺被送扬州西郊七里甸胡场乡张庄农业合作社劳动改造。翻译家陈椿年被降两级发配到青海。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艾煊因对创办《探求者》表过态，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宜兴太华山劳动。方之两次被下放，其中“文革”期间，下放江苏洪泽县劳动时，健康受损。曾华受迫害屈死。叶至诚、陆文夫没戴上“右派”帽子，但陆文夫降两级去苏州机床厂当学徒工，叶至诚被留党察看和降职处分，并下放劳动。

然而，对于50年代早期国家的“爱民而安，好士而荣”的灿烂辉煌，“探求者”们都是念念不忘的，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代人以终身的正面教益，使他们永远保持着“纯信之士、骨鲠之臣”的铁石之志，因而能自觉地实践着《讲话》里提出的用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精神。

从1957年底到1979年这22年的时间里，“探求者”们在历史的大风中遭受吹打，可谓历经磨难，但“探求者”们都不忘自身的使命，于小处而言是秉承了书生襟抱，于大处却是实践了《讲话》的关乎人民情怀，今天看来更是令人心生敬慕之情。

现在还硕果仅存的梅汝恺，从邗江县调到扬州后，几经迁移，在夫人彭安娜教书的三元巷5号新华中学宿舍存身。在那里他白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只有夜晚喝完两大碗稀饭咬掉两块萝卜干后，才有时间“在堆放杂物的一间斗室里，拾掇出一个角落”，坚持每晚三小时的翻译工作。1972年他开始翻译波兰杰出爱国主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显克微支的长篇历史小说《火与剑》。“工作室”的破门被钉死了，他就从破裂的地方进出，还自嘲说这样“保密”做的很好。6年的酷暑炎夏、数九寒冬，从未间断。他迄今译了600万字，有480万字是在这期间翻译出来的。

方之青春刚刚开放出美丽的花朵，就遭遇“反右扩大化”狂风的无情摧残，但21年的遭遇、身体受损都没有扑灭他的心灵之火，1978年“归来”后，他订了个五年计划：“我准备再做五年苦工。”有十多篇作品，准备一一写出。当肝癌病情严重住进医院后，他央求爱人李艾华：“告诉我，我还能活多久。能活三年，我就做三年的打算；倘使只能活一个月，我就马上出院，把最要紧的事情做完……”方之生命力快要耗尽时，他也没忘记作为作家的责任。他把最后的精力花在南京《青春》杂志的创刊上，他亲自电报邀请巴金为《青春》创刊号写稿。1979年10月不幸辞世，享年49岁，难怪他与他的小说被朋友评价为“一团火，一把剑”。

1958年，高晓声回到了家乡武进县农村。他和父母三口人过活，28岁的“右派”还没结婚，只有农村妇女钱素贞，不嫌他的贫穷，不怕他“右派”的铁帽“下嫁”。在1960年，甚至有三个月他一天只能吃到四两糠。他笔下的李顺大、陈奂生等人物的困境，几乎就是他自己的。高晓声在《七九小说集》的代前言《摆渡》中说：“作家没有真情实意，是应该无路可走的”。那么什么是真情实意？对谁真情实意？也就是《讲话》说的“主要服务对象”与“态度问题”了。他在创作谈结集的《生活思考创作》中说：“跌倒了站起来，打散了聚拢来，受伤的不顾疼痛，死了灵魂不散，生生死死，都要为人民做点事，这就是作家们的信念”。这话今天听起来，似乎是豪言壮语，但这却是从1957年的“反右”中走出来的一代作家为人民写作的真诚、文艺自觉。这样做了21年的农民的高晓声，才有了“龟游大海”的不怨天不尤人的“自觉”的生活体验，才能在复出后创作出贴近农民的系列农村题材小说，“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历程，深刻揭示了造成他们辛酸命运的政治、经济、历史及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等深层根源，形象地显示了极左路线给人民造成的苦难”。

“探求者”的重要成员陆文夫其实是泰州人，他何以能在生前即赢得“陆苏州”的美称？那也是因为他根须深深地扎进人民，扎进苏州的小巷。2005年他去世时，一位追悼者说，“陆老师总是把自己当作一介布衣，他把自己的所有情怀都融入到对苏州小人物的关注上，而涉及到国家民族的利益，他从不退让”。陆文夫抱着“九灾十八难，不死还要干”的坚定信念，始终不渝地走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在新时期复出之后，他推出了题为《献身》的第一篇小说。作品“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受到摧残的事实，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大问题，发人深省”。

《讲话》曾谈到文艺创作的“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也强调，人民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走文化发展的群众路线，决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性质。

今天，民众与文艺爱好者，对文艺作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艺创作如何正确看待自身的现实境遇，为人民写出优秀的作品？或许重温“探求者”们一生的“探求”，有益于我们去思考些什么。

洞察

要讲出丁玲“故事”的新意

□蒋晓丽

上世纪20年代，她写下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塑造了“莎菲”这一特立独行的“新女性”形象，喊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新声；上世纪30年代，她写了《水》等作品，为左翼文学提供了新的艺术篇章；上世纪40年代前期，她在延安写下了《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展现了革命文学别样的艺术特质；上世纪40年代后期，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照耀下，她写下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一现代文学史上的艺术经典，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农民“翻身”的壮阔历程与委婉心路；“新时期”后，她不仅写了《牛棚小品》，呈现了“风雪人间”中的苦难与温情，而且写了《杜晚香》等鼓舞人心的作品。她个人的经历，更像一篇传奇的中国“小说”。那么，这个由丁玲一生的真切经历和她留存下来的文本共同构成的丁玲“故事”在新世纪有什么新的意义？2012年4月21、22日，在由中国丁玲研究会与清华大学中文系共同举办的“丁玲研究青年论坛”上，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及美国、日本的30多位青年学者以及特约的著名学者，在清华园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白庚胜出席研讨会并讲话，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张炯发来贺信。研讨会从多个维度呈现了丁玲“故事”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的意义与价值。

丁玲“故事”与中国革命

严家炎在主题演讲中将丁玲独特的人生历程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结合起来，并由此出发谈到了丁玲小说中启蒙与革命双重变奏的复杂关系，他认为在丁玲身上，启蒙与革命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因此，在丁玲的小说中，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也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这使丁玲的小说既具有宏深的历史品格又具有独特的个性色彩。程凯结合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日本性暴力受害者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结合有关史料，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小说进行了新阐释，他认为在丁玲笔下贞贞并没有被描绘成单纯的“受害者”，通过对贞贞“受害”经历及她“受害”后对歧视的反抗，丁玲翻转了这个故事，为主人公提供了新生的契机，由此，这篇小说反映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革命是在“非理想”的历史状态下发生的，而通过对贞贞命运的艺术把握，丁玲很好地再现了这种“非理想”状态。周展安认为《韦护》等作品是丁玲上海生活的产物，以往革命与恋爱冲突的模式并不能解释这些作品，因为这些小说一方面展示了二者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展示了通约的可能，因而这些小说留下了她通往革命之路的印迹。卢燕娟结合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大转折指出，丁玲以自己的文本和人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中国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既包含着旧世界的坍塌，也包含着新世界的创造，在这个故事中，国家、民族、社会等都不是宏大而遥远的，而是和个体生命息息相关。

丁玲“故事”与当下创作

李云雷指出，丁玲以《梦珂》等反映一代青年女性苦闷和挣扎的作品走上文坛，随后在社会思潮与个人经验的相互激荡中倾向左翼文学传统，最后走上革命文学之路。要正确认识丁玲的这种“转变”，就要看到其中“不变”的因素。对丁玲来说，文学是一种改善人生与社会的途径，也是她寻找社会与精神出路的办法，她的“转变”只是从精神苦闷转向了社会改造。在当下的语境中，丁玲的启示之一就是她不断寻找出路的努力。今日文学的困境不仅在于“革命文学”传统的瓦解，也在于“新文学”传统的瓦解，文学更多地成了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这一困境的形成，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革命文学”的自我吞噬，因此，我们必须在反思的基础上重建文学的现实性与批判性。鲁太光则通过对丁玲建国后发表的大量文章和讲话中一再强调“到群众中去落户”的分析指出，这种艺术观是她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吸收的结果，在文学相对纯粹化、作家对生活相对隔膜的当下，这一文学观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韩晓芹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苏敏逸通过对丁玲晚年作品的解读，呼应了这一论点。

丁玲“故事”与中国“故事”

颜海平在主题报告中，结合自己从1980年代到美国留学时所感受到的美国对中国的想象与叙述指出，如果说创造“故事”也就是创造生活的话，那么，在今天，丁玲以其独特的生命历程和文学创作所讲述的中国“故事”具有极其丰富的启发意义，特别是她在对个人与民族苦难的体认中坚持自己的信念、坚信民族的未来，值得尊敬与研究。她还以20世纪80年代丁玲到美国访问时对美国人对她及中国想象——一位来自中国的女性作家，而那时的中国刚刚从苦难中走出来，她个人也刚刚从苦难中走出来——的回答给人以尊严感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并追问：在当下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中，丁玲讲述的中国“故事”对今天我们正在和将要讲述的中国“故事”有什么启发意义？换句话说就是，在今天，我们应该讲述什么样的中国“故事”？戴安德宣读了苏真的论文，根据上世纪30年代丁玲被国民党绑架后，史沫特莱为了救她，将其小说《水》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的事情，并结合文本分析指出，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跨太平洋的文化与思想体系，在那时丁玲就已通过其“写实主义”的文学创作融入这个体系，因此，在跨语际的视野中解读丁玲“故事”与中国“故事”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综述

加强文艺理论阵地建设

□谢子元 陈善君

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5月21日，“《讲话》精神指引与文艺理论阵地建设”研讨会在长沙举行。这次活动由湖南省文联、中国艺术报社联合主办，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创作与评论杂志社、湖南省文联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承办。谭仲池、谭谈、江学恭、康伟等专家学者40余人聚集一堂，重温《讲话》精神，表达对《讲话》的敬意，探讨《讲话》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研究以《讲话》精神为指引加强文艺理论阵地建设。

关于《讲话》的历史贡献和当代价值

康伟指出，《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的根本看法，以形象的语言概括《讲话》的历史地位和贡献。董学文指出，《讲话》的巨大魅力，在于它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文艺观用活了、发展了。《讲话》的意义已超出文艺的范围，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它对一系列问题的阐释已成为我们党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座丰碑。认识《讲话》的历史地位，最好的办法是把它放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谱系中去考察。《讲话》奠定了我国新民主主义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指导思想的坚实基础。《讲话》主张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发展道路依然具有指导和引领的作用。熊元义认为，首先，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奠定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个基础上的，既充分反映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也充分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其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根本的标志是毛泽东提出了文艺家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世界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邱振刚阐述了《讲话》的一个理论价值在于极大完善了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使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具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作用，同时，《讲话》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进行了高度概括，即要求作者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下，来展现“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的全过程。张燕玲指出，《讲话》发表已经70年了，尽管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文艺发展面临许多新问题与新情况，但文艺来源于生活却始终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文艺的规律决定了只有最广泛地占有对人和生活的了解，才能带来巨大的艺术原创力与丰富的艺术可能性。同时，全面贯彻《讲话》中“一切人”、“一切材料”的思想，有利于我们通续连接人类一切有益的精神财富，有利于文艺工作者对专业精神的坚持，有利于我们激发文艺的原创力，从而防止文艺观念与美学理念的片面与偏激。谭伟平认为，《讲话》是从顶层建设对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作出的贡献，不仅有历史高度、历史深度，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关于继承和发展《讲话》精神

董学文提出，对《讲话》应该开展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号召，并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积极投身到讴歌时代和人民的文艺创作活动之中，是重新学习和研究《讲话》的动员令。刘绍峰指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并且将继续给中国文艺带来深刻的变革。运用《讲话》的基本原则、精神和方法，需要在新的创作实践基础上进行当代转换，让《讲话》这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更好地指导当代文艺实践。张燕玲认为，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九次全国文代会第八次全国作代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发扬艺术民主、学术民主”，这既是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发展，是对“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进一步的阐释，更是让文艺回到文艺本身。马龙潜指出，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真正坚持和宣传唯物论、辩证法，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提高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自觉性，是当前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研究所面临和亟待解决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重温《讲话》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关键所在。欧阳友权提出研究以《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两条路径：一是回到原点，阅读经典；二是回应现实，守正创新。

关于以《讲话》精神为指引加强文艺理论评论阵地建设。

《创作与评论》（原《理论与创作》）是湖南省文联主办的文艺刊物，创刊二十多年来，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立足湖南，面向全国，关注现实，扶持新人，对湖南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和繁荣兴盛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促进作用，也在全国文艺界尤其是文艺理论评论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会专家学者对加强文艺理论评论阵地建设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张燕玲认为，《创作与评论》以“追求湖湘气派、兼容百家风格”为宗旨，立足湖南、面向全国，坚守理想、关注当下，改版后文艺原创作品与文艺评论同刊，努力打造湖南文艺第一现场，“重点推介”、“新锐之思”等栏目颇具深度与敏锐感，把湖南文艺评论人才与话语空间有效地整合到刊物工作平台中。她提出，如何进行自身的建设，寻找到自己的学术生长点，在新的文化格局中获得新发展，是文论期刊面临的最大难题。韩小蕙认为，我们对于青年问题还是关注不够，应该研究新时代、新形势、新观点，引导青年一代的创作。她主张鼓励个性的发展，不可强求一律，期待更多关注当下、关注新生活的作品。谭仲池指出，《讲话》不仅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最根本的就是要弄清文艺创作到底为什么人，怎样去创作，文艺评论坚持什么标准等这些基本问题。我们要更加负责任地办好自已的文艺创作和理论刊物，尤其要发挥对青年、对社会、对创作的引领作用。一个刊物发挥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但是只要坚守下去，效益就会不断扩大。他希望专家们共同把这块文艺理论评论阵地建设好。

微型诗的美学特征

□钱志富 倪捷鸣

笔者供职于宁波大学，知道微型诗这个新生事物很晚，据说是1996年重庆的一批老诗人深感一些人将诗歌越写越长，破坏了诗歌的精练，特意提倡写短诗，他们出版一份刊物《微型诗》，专门提倡写一到三行之间的短诗，他们将一到三行之间的诗特地命名为“微型诗”，结果引发许多人的赞成和支持。如今《微型诗》已经出刊近二十年，发表作品数十万首，出版微型诗集和诗歌选集几百部，后来还专门创办了微型诗网站，微型诗的创作进入繁盛的状态，其中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微型诗人，出版了许多优秀的微型诗集。

历史地来看，中国古人很早就在创作微型诗，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个作品应该就是一首微型诗：“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明清两朝进入微型诗创作的繁盛期，有人这样描述唐代以来的中国诗史——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对联。对联一般只有两行，符合微型诗的体式要求。所以如果将明清对联算作微型诗，那微型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成绩是优异的。

横向地看，微型诗不仅在中国有，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有。日本国的俳句体型微小，只有三行，第一行五个音节，第二行七个音节，第三行也只有五个音节，是典型的微型诗作品。如今俳句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诗体，一些中国诗人也能写出很好的俳句作品。其他国家的诗人中，泰戈尔写过许多微型诗。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的《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脸/湿润枝头的花瓣”，可以说是世界诗歌史上最著名的微型诗作品。

中国新诗产生以后，微型诗作品时有出现，一些微型诗作品甚至流传很广。艾青的很著名的一首诗只有一行：“谁能跟沾满同志的鲜血的人握手呢？”就是流传很广的一首微型诗，艾青无愧为一代大诗人，他的这句诗振聋发聩，是对那个血淋淋的时代的诘问。麦芒的《雾》：“你能遮住一切吗？”在当年的《诗刊》发表后也不胫而走，流传十分广泛，成为一种经典。顾城的《一代人》：“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为几代人所传诵。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微型诗》创刊以来，许多优秀的微型诗作品产生，可惜的是诗歌在这个时代遭遇到商品经济和流行文化的巨大冲击，整个世界对诗歌失去兴趣，微型诗的繁荣没有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欣赏，微型诗不为世人所知当然就是不足为怪的事了。

微型诗作为一种诗体，它的美学特征就是短小、精炼。微型诗同所有其它种类的诗歌一样都具有抒情、叙事、写景和说理的功能，可是微型诗的体式限制在一到三行之内，不能长篇大论地抒情、叙事、写景和说理，微型诗人从美学上讲是那种有能力“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人，他一定要从有限的诗行中创造出无限的艺术空间，他的作品必须采用意象化的手法，将情、事、景和理都意象化。庞德的做法是对的，他的《地铁车站》从二十多行精简到最终的两行，他的作品之所以影响那么大，因为它的美学的成功。

微型诗在抒情上不太可能滥情，可惜的是一些微型诗人以为什么感情都可以进入作品，结果写出了品位不够高的作品。微型诗诗人最喜欢说理，可惜的是一些微型诗人不懂得不是什么样的理都可以进入作品，结果写出了一些言说平庸思想的所谓哲理诗。写景也是一样，一些微型诗人笔下的景过于普通和平常，没能进入真正诗歌的境界。

微型诗人要懂得诗歌的意象美学，要懂得意象叠加的绝妙技巧，更要将自己的生命和灵魂献给诗歌艺术，献给他生活的这个时代，献给历史和现实，微型诗同所有的诗歌体式一样，它有高规格和严要求。微型诗虽然短小，但短小不意味着没有精彩的艺术内蕴，相反微型诗是真正“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是“以一寓万”的艺术，是“以有限表现无限”的艺术。古人有所谓“骨里无诗莫浪吟”的铭言，微型诗也应该来自生命和灵魂深处的东西，微型诗不是一旦到三行的散文，它一定是诗，短小、精炼的艺术精品和珍品。